

0311

景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景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景县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景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编 审 机 构

主 办：景县政协

编 审：赵金凤 王金瑞 王书明

责任编辑：王金瑞

校 对：韩仲儒 张德志

封面设计：张元洲

封面题字：王任重

前 言

《景县文史资料》第三辑，承蒙社会各界人士关心、支持，历经两载，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在本辑的编审过程中，我们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两面旗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在把好史实关、文字关的同时，兼顾了资料的可读性、趣味性。现把这本 12 万字的小册子奉献给大家。

本辑共收入革命、军政、社会等史料 17 篇。其中，有为本资料题字的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生平，有景县籍在外地的几位老同志赵云容、王书波、赵士英、徐文俊等写来的自传和回忆张俊峰、阎晶昌及其他先辈抗战的史料；有回忆景县籍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也庭宾的文章，有军政人员赵秀西回忆台湾“二·二八”起义的经历，有已故原政协委员肖金中回忆傅作义部绥远政工队的遗篇；最后 4 篇社会史料，一篇是太平军血战连镇的史实，一篇介绍了景州古塔，一篇叙述了高氏墓群及高氏家族，一篇是魏探花的轶闻軼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书的主人公虽已大多作古，或名垂千古，或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以史为镜，可知兴衰。这也正是本书的编辑宗旨。

由于编辑人员水平和经验所限，错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1995 年 12 月

目 录

王任重同志生平	(1)
最后的时刻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薛建华(4)
我的自传	赵云容(8)
峻峰苍翠	王书波(16)
惩罚恶霸程希圣	王书波(27)
血战任角	王书波(31)
几点往事	徐文俊(34)
掩护八路军的一幕	赵士英(44)
回忆先父赵书祥	赵士英(52)
刚正师长乜庭宾	武俊英(58)
阎晶昌传略附:抗战时期的小放牛	王书波(66)
我的经历及台湾“二·二八”起义 ...	赵秀西(77)
傅作义绥远游击军政工队	肖金中(87)
“长毛”血战连镇的史实	王金瑞整理(105)
高氏家族与高氏墓群	郑东方(113)
漫话景州塔	郑东方(128)
魏探花轶闻	张学铭(133)

王任重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于1992年3月16日上午6时1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王任重同志于1917年1月15日生于河北省景县一个农民家庭。在学生时代，他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光明之路，于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近60年有声有色的革命生涯。

入党后，王任重同志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不顾个人安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任景县县委委员、泊镇区委委员、津南工委委员，为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任重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回冀鲁豫地区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长、区党委常委、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为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

1945年以后，王任重任冀南行署主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不遗余力地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支援前线，进行土地改革，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立下了功绩。

1949年5月王任重随军南下，历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湖北省

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华中协作区主任。在湖北地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事业中，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迫害，被关押。1978年恢复工作后，历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陕北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为解放与发展农业生产，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8年3月被选为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四年多以来，他殚精竭虑，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basic 路线，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维护和巩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大业，不懈地努力，取得卓越的成绩。

王任重同志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王任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党无限忠诚，毕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他孜孜不倦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他有高度的党性，始终以一个普通共

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风范。他身体力行地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王任重同志在病中十分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关心三峡工程。

王任重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品德、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王任重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

最后的时刻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薛建华

1992年3月16日是即将举行的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委员报到日，1800名委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到首都北京，出席这次盛会。大会秘书处的各个机构正在紧张工作着……

然而，一位一直为这次大会而忙碌的人，却悄然离去……

晚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人们不敢相信的消息——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常委会讣告，无产阶级革命家、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3月16日上午6时10分在北京逝世……

一周前的3月9日上午8时许，王任重刚刚起床，胸口便阵阵发痛。秘书曹志勤、参谋王福庆忙问：“王老，你怎么了？”王任重说：“胸闷，乏力。”

闻讯赶来的保健大夫牛福康等人给王任重做了心电图，心电图呈不规律变化……

“疲劳过度，引发急性心肌梗塞”——情况严重，立即住院。

王任重被送进了北京医院。躺在病榻上，他一刻也放不下：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还有两天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全体会议还有10天就要举行，这个时候病了，真不是时候。

全国政协秘书长宋德敏来看他，他拉着宋德敏的手说：“我这个病来得不是时候，看来政协常委会议我是不能参加

了，李先念主席还委托我主持会议呢。”

“任重同志，你安心治病，我们盼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宋德敏安慰他。他知道这些天来，王任重同志实在是太累了……

2月19日，结束在南方考察工作的王任重一回到北京，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第二天，他接待了来自埃及的一个大型代表团；

之后，李先念主席找他商谈如何开好政协常委会议和政协七届五次大会：

之后，他和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研究会议的具体议程和日程；

之后，他投入紧张的会议准备工作之中……

在发病前3天，他除为政协工作操劳外，还为准备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会议而忘我工作：

3月6日，他把李鹏总理送来征求意见的政府工作报告认真改了一遍。在报告征求意见稿上，他对1992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提出了看法。他写道：“注意防止盲目扩大基建项目和单纯追求产值偏向，把提高质量效益放在中心位置。”

3月7日，他认真阅改完刘复之检察长送来征求意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上写道：“你的讲话我看了，不错，我很赞成。”

3月8日，他又细心看完任建新院长送来征求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他对曹志勤秘书说：“这个报告很好，我没有意见，请即送建新同志。”

超负荷的工作，使75岁的王任重病倒了。躺在病榻上，王任重依然惦记着政协常委会议和政协大会。住院第二天，他

把宋德敏秘书长找来，研究政协常委会的有关事项。

宋德敏告诉他：“邹家华副总理明天要来作三峡工程的论证报告。”

“盼望多年的三峡工程问题列入政协议程，我却不能参加，真是件憾事。”王任重说，“关于三峡工程问题，要让常委和委员们充分讨论，反复酝酿，让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充分发表。”

病情稍有些稳定，王任就不断问大夫：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能不能参加政协大会？医生要他静心养病，并说：“如果配合得好，病情好转，是可以参加大会的。”

然而，他却静不下心来。

他向政协推荐广东一位委员关于加强党的凝聚力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不错，可以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3月13日，曹志勤秘书来到医院，王任重又问他：政协常委会开得怎么样，常委们谈了哪些意见。曹秘书回答说：“开得很不错，发言很踊跃。”

跟随王任重三十多年的曹秘书怕他过分操劳，忙岔开话题：“你过问多次的湖南祁阳县陶铸中学重建筹款已经基本解决。”

王任重欣慰地笑了：“这是个好消息，问题总算有了结果。”

时刻关心着工作和他人的王任重，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16日凌晨4时许，他的病情急剧恶化。6时10分，心电图上呈现出一条长长的直线，他那颗搏击了75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江泽民、李鹏、乔石、宋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来了；王光

英、赵补初、钱伟长、程思远等与党风雨同舟、合作共事的党外朋友来了，他们饱含着热泪向王任重同志告别，慰问他的夫人肖惠纳和子女……

王任重，这位早年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没有赶上他应该出席的会议。王光英说：“他是为政协会议累倒的，他走得太快了，太快了……”

我的自传

赵云容

按：赵云容同志（女），系我县赵官寺乡小刘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党指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毕业后长期留在苏联工作，为国际共运作过一定贡献。她身在异邦，心怀祖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多次要求回国工作，1956年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回国。初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后因年老多病，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离职休养。以85岁高龄于1989年7月在北京去世。本文成了她最后一篇遗作。在此发表本文，藉以表示我们对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深切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我于1904年生于河北省景县城北的小刘庄，老家在我印象中是个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地方。父亲原是个目不识丁的穷泥瓦匠，为人忠厚诚实，以走村串乡为人修房盖屋谋生。成家后，因子女多，生活过得很艰难。我的几个哥哥从小就帮助父亲干活；几个姐姐更是没有念过书，而且都早早出了嫁。就在这惨淡的节衣缩食生活中，父亲设法把我年幼的四哥送往出了嫁的姑姑家中念了几年私塾。当时正值清朝末期扩练新军之时，四哥得以考入保定武备学堂。后来，他成了旧军队中的军官。从此，改变了父亲的经济地位，由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变成了置田买地的地主。

我父亲墨守成规，有严重的封建顽固思想，在他眼里妇女是无权受教育的，只能一生听命于夫。我上学受教育确实是个偶然的机，那是我的四哥和六哥在当时的北平都有

了职业并成了家，四哥把我从老家接到北平是让我给他照看第一个孩子，当时幸亏六哥思想开明，极力主张让我上学念书，还亲自教我识字念书，终于帮助我上了小学。我就像一只长期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旦飞出鸟笼，就尽情地吸吮着知识和自由。我深深的记着当时坐在那明亮的教室里，看见那衣着整洁、落落大方的女老师在讲台的姿态，为她们的谆谆善诱的言辞所感动。我心里想：我长大了也要做一名女教师。高小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师范学校当作我的升学志愿。我报考了当时在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并且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录取了，当时父亲和四哥极力反对我继续求学，并且命令我也像姐姐们那样早日出嫁，我求学心切，再三向家人央求，也得到六哥兄嫂的支持，最后终于同意我去了保定上学。临行前，我被告诫许多严厉的训示：“女孩子家在外面上学，不许有任何越轨行为。如果给赵家丢了人，就要揍死你。”我一向惧怕的四哥也说：“只准好好念书，不准参加乱七八糟的学生运动，不准和不三不四的人交朋友，如果犯了这些事，回来就活埋你！”……

1923年秋，我从北平到了保定就读于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我勤奋好学，酷爱钻研，善于思考问题，努力追求新知识。我认真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上许多文章，还读过介绍共产主义原理的《共产主义ABC》、《独秀文序》等书籍。这些书启发了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童年遭遇的一切。旧家庭封建礼教灌输给我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不都是书上那种腐朽的旧中国统治阶级强加在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吗？我开始觉醒了。我不愿做封建势力的奴隶！我渴望革命。我开始积极参加学校里的一切

政治活动。女师校长是个满脑子封建思想的腐朽人物，经常散布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这引起了进步师生的不满，校园里开展了一场驱逐腐朽校长运动。我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结识了比我高两个年级的李培艺（后改名李培译）。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热情鼓励我起来斗争，她耐心细致地向我介绍了共产党的宗旨和革命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1924年她介绍我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组织领导下我积极参加了保定蛋厂的女工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

1925年9月经李培译、张庭瑞二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在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响应全国的声援抗议活动，积极组织了保定的宣传、游行、抗议等活动。在保定我们公开组织了保定学生联合会。联合了育德中学、保定第二师范学校，我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的女师代表。那时候，在保定参加党的活动的有女师的李培译、王少华、张西园；育德中学有张庭瑞、孙有曾、王敬臣；保定二师有王鹤寿、黄忠瑞等人。

1925年秋，保定女师因学潮开不了学，我从保定回到北平家中，四哥对我态度更加恶劣。他已知道我在保定参加政治活动，便与父亲商量想以包办婚姻的方式迫我辍学结婚。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以家长的命令口吻通知我年底就办结婚大事，这真是晴天霹雳。使我陷入彷徨苦恼之中。我知道自己处境，但也拿不定主意，便及时地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积极支持和帮助我，给我鼓起了斗争勇气。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毅然决定站起来，坚决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我计划等待时机离家出走。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党组织，组

织上也作了妥善的安排。我告诉家人，在结婚前让我继续在平民大学念书。这样，暂时表面上缓和了与家庭的紧张关系。我在平民大学念书期间，党组织分配我兼做学生工作，以后党组织又安排我在“济难会”中当了秘书。“济难会”是党领导的一个公开的群众爱国组织。它的宗旨是宣传、动员国人共济国难。1925年年底，我与家人的关系更趋紧张，已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婚期临近，我怕家人把我软禁起来强迫从婚，于是在这年年底，在这北国冰封大地的季节，我毅然决定只身出走，离开了从小就用封建礼教束缚我的家庭。党组织把我安排住在极为保密的北方区机关内，我深居简出，躲避家人的搜寻。同时也接受了党安排的革命工作。20多年后我才得知，那时家里人确实煞费苦心在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中搜寻我的下落。

1926年年初，在北方区机关时，组织上先是我抄写文件资料，后又分配我在北方区农村部工作，同时还担任了支部书记。

在北方区机关工作期间，我认识了赵世炎、刘伯庄、陈乔年、夏之栩等同志。在这些同志当中，赵世炎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他是搞宣传工作的，经常给党员做报告，很有口才，讲话时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在我心目中，他不愧是一位共产党员的楷模。

1926年年底，北方区机关党组织派我去苏联莫斯科学习。那时派去苏联学习的人很多，我去的那一批就有100余人。与我同去的女同志有刘亚雄等人。我们是从上海经海参崴进入苏联国境的。

1927至1929年，我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在学习期间，根据党内的安排和决定，我在组织上转入了苏联共产党。那时想法很简单，服从组织安排。共产党员必须懂得国际共产主义的概念。苏联是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在苏联学习的目的是将来回国继续深入革命。因此，我个人没有理由不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我与同班同学郑一俊结婚。婚后我俩被派往苏联远东区赤塔市附近一个金矿上工作。在矿区我担任了指导员，做东方工人工作。矿区中的东方工人以中国人居多数，此外还有朝鲜人等。

1931年，调往赤塔区总工会工作，先担任总工会东方工人指导员，以后又调到赤塔市党校担任中国部主任兼教员。在赤塔工作时，正值苏联经济困难时期，食品短缺，物资匮乏，一切供应都是严格的配给制度。我们家庭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全凭着满腔对党的忠诚和革命热情而顽强的工作。但长期的工作劳累，缺乏营养，我爱人郑一俊患染上了肺结核。当时的肺结核几乎是不治之症，没有特效药，加上医疗条件也很差，他大口大口的吐血，使我惊吓不已。我集中了全家的营养食品来精心护理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身体上的尽力治疗，最终战胜了病魔，使他获得第二次生命。

1935年春，我和爱人被从赤塔市调回莫斯科，新任务是苏共派我俩回中国新疆工作，我们把两个孩子安顿在莫斯科幼儿院里，便回到了新疆。开始我担任了乌鲁木齐女子学校职业部主任兼教员。

1936年我和郑一俊又被派往南疆地区的和田。我被委任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当时和田的驻军头目是一回族军阀名叫